

國家意志下，人文社會學術生產的再反思：Bourdieu場域分析的啓示

Under the Will of the State, Rethink the Academic Produc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Taiwan: A Perspective of Bourdieu's Field Theory

邱天助

Tian Juh Chiou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Shih-Hsin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本文旨在以Bourdieu的場域理論分析人文社會學門在臺灣學術場域中的關係地位，揭露人文社會學術發展的現實與困境，並試圖指出在這種局勢下，人文社會學者行動力可能的作用所在。分析顯示，在全球的學術場域中，臺灣一直處於邊陲或半邊陲的地位，人文社會學門更是處於邊陲或半邊陲場域中的邊陲位置，加上臺灣大學教師長期對美國和西方學術的依賴，人文社會學者往往具有明顯的邊陲性格。更由於臺灣大學教師人數急速增加，文化或社會資本的分散，缺乏累積「科學權力及社會聲望」的條件，使他們只能選擇以累積「學術權力」為目標。如今，大學教師越來越像國家的高級公務員，逐漸養成「等因奉此」的生存心態，對大學場域的權威有著類似公務員，甚至軍人的絕對忠誠。在國家的「計畫性知識」的規劃下，大學教師逐漸變成學術生產線的小包工，成為國家競爭力生產大隊的一員。這對原本具有「抽離」和批判傳統性格的人文社會學者產生嚴重的學術扞格，也陷入生命的弔詭和生存的困境。



本文指出為了避免淪為製造論文的機器，使學術生產與學術價值產生分離，人文社會學者唯一的「救贖」是用身體的實踐而非口語文字的論辯。他們必須拋開合法學術制度的委託和權力賦與，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層級」，以知識份子的身份參加生產的行列。首先，人文社會學者應先以解構國內SSCI化、TSSCI化的層級性為目標，讓臺灣學術期刊多元性的發展；其次，必須讓自己的學術生產直接面對自己的讀者——廣大的社會大眾，以專書或網路書寫的方式，重建系統研究的專書價值；最後，本文建議人文社會學者若以學術自主性出發，面對SSCI化的評鑑制度，必須採取身體力行的策略，在任何人文社會學術評等裡，如大學評鑑、教師升等或獎勵，以共識或默契的方式，採取非SSCI化的評審理念，打破量化的迷思，讓真正有品質的學術生產獲得應有的回饋，這才是真正釜底抽薪的辦法。

Adopting Bourdieu's perspective on field and habitu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al posi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Taiwanese academic field and tries to put forward some possibilities of their agencie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relevant evidences show that, in the global academic field, Taiwan has been marginal or on the marginal section of semi-marginal status. In addition, owing to Taiwa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long-term dependence on the academic knowledge of American and Western core countries, academic activities among Taiwanese schola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end to be marginal. Furthermore,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the scattering of "cultural or social capital" and a lack of the capacity to accumulate the scientific power and social reputation, they can only choose to pile up the "academic power". Nowadays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aiwan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like high-rank official, gradually forming the law-abiding habitus and holding the public officials or even the soldiers absolute royalty to the authority of academic field. In the schema of "lanned knowledge" of the country, university teacher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labor contractors of the academic production line,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competition. These factors result in severe academic contradictions among schola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who used to be characterized by critical thinking, landing them in

paradoxes and dilemmas in their liv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o avoid becoming the machines of papers producing, the only way to the “edemption” of schola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would be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 by bodies rather than to debate orally. They have to throw out the commission and power bestowed by the legitimate academic institution, take efforts to upgrade their own “ultural hierarchy” and to join the teams of academic production as the roles of intellectuals. First of all, scholar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ought to aim at deconstructing the hegemonic hierarchy of SSCI and TSSCI in Taiwan, making the divers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academic journals possible. Secondly, their academic products have to face their readers the extensive audience in societies by publishing books or publishing on the internet. In doing so, the value of books will be re-established.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if schola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would like to claim their autonomy, why not just comply the so-called SSCI evaluation system, such as university evaluation, teachers promotion or academic reward, in public but oppose it in private. They could adopt the non-SSCI evolution criteria, either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to break up the myths of putting emphasis only 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t would be the fundamental way to let the real high-standard academic productions stand out and get the well deserved feedback.

[關鍵字 Keywords]

學術場域；學術生產；生存心態

Academic Field; Academic Productions; Habitus

壹、前言

自從2000年代以來，臺灣學術生產的生態環境與控制機制產生明顯的改變。在全球化的脈絡下，以美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學術生產走向，幾乎已成為後進國家的學習典範。為了擠進霸權世界的排行榜，臺灣學術生產有關機關（包括高等教育主管機關與國家學術研究單位）不顧強烈的反對聲浪，野蠻式的把複雜的學術生產化約成可以價格化、標準化的勞動商品，以極為簡單的量化記帳方式，即所謂的SCI、

SSCI、A & HCI或TSSCI等刊物的發表篇數，作為學校、教師或研究人員的評鑑機制與獎懲標準。這種學術生產與評鑑制度，引起人文社會學門的研究人員和大學院校專任教師，諸多激烈的抗辯與反動。因為它不但涉及學術自主，以及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問題，也關係到學術資本、經濟資本的累積，甚至是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形成，進而影響到學術權力與地位的排序與流動。

有鑑於此，幾年來一些人文社會學者不斷提出反對量化學術評鑑的論見，但是相關單位仍然一意孤行，使得臺灣學術生產籠罩在量化評鑑的風暴中。2004年9月，一群人文社會學者在台北國家圖書館，召開「反思臺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以公共論壇的形式，對現行學術體制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尤其對學術全球化等於英文化、美國化、SSCI化的方向，提出質疑和駁斥，然而，在許多人文社會學者批判的論述中，卻也隱藏某些弔詭和困境，值得我們再深層的思考與反省，因為這些地方，正可以說明為何有這麼多的反對聲浪與抗辯行動，卻無法撼動目前這種SSCI化的學術評鑑體制分毫之原因所在。

其一，論者皆強烈主張，臺灣學術界不應該再以SSCI、A & HCI或TSSCI的期刊論文篇數統計，作為升等或獎勵的依據。但是在實行（practice）層面上發現，一些在研討會上鏗鏘發聲，或為文激烈抗爭的學者，在校園內卻往往會被迫或主動扮演這種SSCI化學術評鑑的激勵者、推動者、執行者，或是默然的遵行和跟隨者，形成反動的「兩手策略」：陰奉陽違，轉身成為制度的共謀者。

其二，論者雖然皆反對獨厚期刊，也反對獨尊英文的評審制度，但對於一些勤用華文寫專書的學者，卻以一群「自我放逐的邊緣者」稱之，而非「批判的實踐者」予以讚賞，甚至認為專書冊數愈多者愈與臺灣社會學脫節（李丁讚，2005，頁303-304），顯示出在一些論者的潛意識中，仍然存在主流/邊緣、正統/異端的學術層級劃分，隱然在建構、鞏固學術結構上的位階差序，充分顯示出學術場域的權力遊戲：對外抵抗霸權，對內建構霸權。

其三，從反對者的論述中發現，論者大多以學門自主的立場，進行學術正義的發聲，很少談及自己被不公平對待的實際經驗。這種反思往往會把作為批判者的自己，從批判的位置中虛構般地抽離，然而卻實實在在地生活在這些批判性場域的某一位置；弔詭的是，在論辯中，一些深深地支配著學術發展背後的宰制者，通常是「不在場」，或是始終沈默，卻是真真實實的透過國家意志，展現他們的學術權力。

因此，在論述與實行的落差中，在主流與邊緣的分類中，在虛構與抽離主體的論述中，不免令人質疑有些為文論辯者就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雖然激烈反對SSCI化學術評鑑，但真正行動的目的並非想積極改變當前的評鑑制度，或自知無力改變這種「事實」，如此一來，剩下來真正可能達成的目的，隱藏的或更重要的目的，就只是取得學門的發言地位，為自己累積一些學術或符號資本。一些反駁與抗辯行動，充其然只不過是學術圈中知識與權力的遊戲，卻充分反映人文社會學術場域中的現實與困境。為此，本文論述重點主要以Bourdieu的場域理論（theory of field/champ）分析學術圈中結構（structure）與行動主體（agent）的相對關係，揭露人文社會學門在臺灣學術場域中的權力地位，並試圖指出在這種局勢下，人文社會學者行動力（agencies）可能的作用所在。

貳、Bourdieu場域分析的基本概念

在一般意義上，學術生產是屬於自主性、自發性的行動，但在目前臺灣的學術場域顯然並非如此，知識生產正處於一個自上而下的「知識規劃」時代。在這個時代裡，知識生產並不是自主性知識活動的結果，而是或根據某種特定的知識規劃（例如國際化、SSCI化），或以國家發展的邏輯為原則（例如提升國家競爭力），而由某種特定的「集體性」、「規範性」知識生產機器的生產和再生產。近年來，政府把學術生產的數量併入國家競爭力的評量指標，知識的生產被賦予了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使命，透過國科會研究補助、「卓越計畫」、「世界一百大」、「五年五百億」、大學評鑑等策略、手段和誘餌，急欲增加臺灣學術的生產數量，提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於是，原本獨立自由的人文社會學者被收編在國家生產的體制之下，淪為執行國家意志的重要工具。

但是，無論是「知識規劃」時代，還是「集體性知識生產機器」的功能發揮，都是以知識生產者的共謀為前提。因此，如果我們對這個「知識規劃」時代和「集體性知識生產機器」不進行深度的反思和批判，並且揭露隱含在知識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之中的各種社會條件或權力關係，那麼將無以解釋為何許多大學教師淪為學術機器的機械生產工具而不自知，或雖然有識於此卻無力掙脫的困境，這正是Bourdieu的場域分析的功能所在。

在Bourdieu的概念裡，場域是由不同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所決定的位置（positions）之間，彼此的客觀關係所形成的網絡和建構（Bourdieu, 1977）。不同行動主體其資本的差別其實也是權力關係的形成，因為它決定了宰制及被宰制的位置分配，也影響著行動主體進一步

爭取利益的機會。因此，場域不論大小、類別，其間總有尊卑、高下、優劣的系列區分，也因此，場域的不同位置間總是存在著宰制及被宰制的關係。

由於場域並非靜止不動的結構，在不同位置上，行動主體會相互爭奪以獲取、積累或壟斷不同形式的資本（物質、服務、知識、身份、地位等等），造成權力的流動和秩序的變遷。當人們相互爭奪各種有價值資本時，包括爭奪規定有價值資本的合法性，資本也就形成了權力的社會關係（Bourdieu, 1989b, p. 375），因此，Bourdieu把場域看成是人們爭奪有價值資源或不同形式資本的場所。但是，Bourdieu也承認，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一個場域可能會以一種「機器」（apparatus）的方式開始運作。當宰制者成功地壓制、弭平被宰制者的反抗和敵對時，當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完全以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時，宰制的效果就會加強，以至於構成場域的各種鬥爭關係和辯證關係都會停止發揮作用（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場域有各種類型和結構，圍繞不同類型資本的分配和爭奪，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場域。其中，知識場域（intellectual field）是符號生產者（如藝術家、作家、學者）爭奪符號資本的地方（Bourdieu, 1971a）。知識場域的各種體制、組織和市場都以符號資本的生產、流通和獲取為其主要特徵。因此，Bourdieu對知識份子的分析是一種以符號生產者角色為著眼點的文化社會分析，著重在知識份子與文化生產的場域和現代社會的等級關係上。學術場域（academic field）是更廣闊的知識份子場域中的次場域，主要是由大學教師、研究者所組成。為了要瞭解學術生產的社會世界，進而掌控影響知識論述以及社會生活的條件（Bourdieu, 1996/1984, p. xiii），在《學術圈》（*Homo Academicus*）一書裡，Bourdieu對學術場域的結構和功能有清晰明確的解析（Bourdieu, 1996/1984）。該書勾勒出學術場域的輪廓，揭示出大學是學術鬥爭的場所，其獨特的動力機制反映了在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之間的貫穿宰制階級的張力。

在Bourdieu的場域分析中，「生存心態」（habitus）是個關鍵性的概念，他用「生存心態」來解釋存在於不同場域間的異體同型關係（Bourdieu, 1977, p. 83）。生存心態所指的不是個體性的、技能性的熟練習慣，而是一種集體性的、持久的、規則行為的生成機制。Bourdieu強調，生存心態一詞的關鍵是「稟性」（disposition），它首先是指引起結構作用的行為結果，近似於「結構」這一概念。它還指一種存在的方式，一種習慣狀態（尤指身體），特別是指一種趨向、傾向、素質、偏好。在Bourdieu的概念中，生存心態是行動主體外部生存條件或結構，

透過自我覺知，轉變為自我期待的結果。因此，它存在著主觀/客觀、結構/主體的辯證關係。在層級化的社會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將實際生存條件的可能性，內化而形成種種不同的行為傾向（自我期待、應對方略、行事標準等等），這些不同的行為傾向也就是不同的生存心態。因此，生存心態一方面制約行為，另一方面又產生行為，它受到結構性的限制，但又是行為(包括觀察、自我期許)的生成模式，Bourdieu說是「結構中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 (Bourdieu, 1977)。

Bourdieu對知識份子的分析，強調的不是唯意志論的選擇，而是在實際生存環境的限制下，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門道和路數，也就是生存心態。Bourdieu認為知識份子的生存心態不是本質的，而是相對性的，不是意志主導的，而是由客觀生存條件形成的。Bourdieu指出，在大學場域裡，學術權威在社會空間的地位主要是依賴文化資本的擁有，那是一種資本的隸屬形式。大學教授大多處於權力場域從屬的那一邊，而且明顯的與工商企業的經理是相對立的，但是作為文化資本制度化形式 (institutionalized form of cultural capital) 的所有者，由於這種資本保障他們科層體制的生涯和正常的收入，在文化生產的場域中佔據暫時性的宰制地位，他們與文化生產場域中較少制度化和較為異端的佔有者有所不同，特別是依賴性的或自由撰述的作家和藝術家。因此，Bourdieu認為大學教授類似於高級公務員，更勝於作家和知識分子 (Bourdieu, 1996/1984, p. 36)。

參、Bourdieu知識與學術場域的分析

在Bourdieu的知識政治經濟學中，強調的不是自由的資本交換，而是不自由的知識生產，也就是那些在特定權力關係支配和影響下的知識生產、流通和再生產的情況。Bourdieu特別重視社會分層、政治矛盾、不平等社會關係、符號權力和符號暴力、統治和被統治關係的再生產等一系列問題，認為一切社會都存在剝削與宰制，一切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都必須依靠「符號暴力」(symbolize violence)，把任意的歸類 (classification) 及等級 (hierarchization) 系統自然化，從而使宰制的關係合理化 (Bourdieu, 1990b)。知識份子為符號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因此在這一爭奪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就其階級地位而言，知識份子處在既宰制又被宰制的矛盾地位中。Bourdieu認為由於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之間存在著強弱優劣之別，而佔

有文化資本的知識份子，包括大學教師，所代表的實際上是「宰制階級中被宰制部分」(the dominant fractions of the dominant class)，或「宰制階級中的隸屬部分」(the subordinated fractions of the dominant class)，或宰制權力場域中的被宰制一端(Bourdieu, 1996/1984, p. 176)。他們隸屬於宰制階級是因為享有文化資本的權力和優惠，甚至有能力的提供或顛覆社會秩序的合法性，但是，他們卻常常不得忍受優勢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者的宰制，而成為被宰制者。

Bourdieu反對以階級地位來衡量知識份子的立場和行為，他認為一切知識份子之所以為知識份子，是因為他們在知識場域內佔據著重要地位，雖然不一定是顯要但是有一定份量(Bourdieu, 1972)。知識場域內成員間的爭奪，首先集中在場域內發言的權威性，有了這種權威，就能規定什麼是場域內具有合法性的文化產品，這種地位的差別是由文化和符號資本的不平等關係所造成的(Bourdieu, 1983)。

Bourdieu認為學術圈的人並不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他們在爭奪符號合法性的鬥爭中，存在著嚴重的等級分歧，而且場域內外的鬥爭又有所不同。對於學術界的人來說，在場域有限範圍內文化生產和爭奪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為它關係專業的合法性，所爭奪的不僅是同僚的認可，而且還包括設置標準及合法性的權威(Bourdieu, 1971b)。

Bourdieu注意到19世紀大學場域或高等教育場域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的發展。早期大學教授是由掌握政治權力者任命，為政治權力服務，其後大學自行聘用教授，大學教授變得專業化，他們以從事獨立研究、發掘真理為己任，甚至往往與統治者格格不入，同時也與知識場域保持一定距離，由於他們擁有特殊的方法論，因此也打破批判主義和流行社會之間的傳統關係(Bourdieu, 1996/1984, p. 37)。Bourdieu認為大學場域結構反映權力場域結構，他強調大學場域的相對自主性，導致高等教育機構相當程度上掌控了自我再製(self reproduction)的過程，也帶來了大學場域權力的進一步分化。

Bourdieu指出在法國1960年代的大學裡，屬於「暫時宰制性的學門」(temporally dominant faculties)，即法律、醫學和工商，權力主要源於「學術資本」(academic capital)，其權力是對位置和物質資源的控制；在另一面「暫時被宰制的學門」(temporally dominated faculties)中，即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權力基本上建立在「知識份子資本」之上，也就是說，建立在由地位相等的同儕來衡量的科學才能和科學成就之上(Bourdieu, 1996/1984, pp. 59-62)。

Bourdieu進一步指出，大學場域中擁有「學術權力」（academic power）者控制了場域中其他參與者的遴選、升遷、以及生涯發展。這類權力的基礎是對場域中其他位置及位置佔據者的掌控，它屬於組織再製的權力（Bourdieu, 1996/1984, pp. 40-84）；與「學術權力」相對的是「科學權力及知識聲望」（scientific power and intellectual renown），所指的是對學術研究資源的掌控、在科學界的聲望，以及為受過教育的公眾（educated public）所認識的程度（Swartz, 1997, p. 241）。不同學院對這兩種權力的重視程度是有差別的。一般而言，理學院較強調學術研究，它們相對重視「科學權力及聲望」，因而把注重累積「學術權力」的行政人員（例如系主任、學院院長及校長等）看成是較次等的。然而在法學院及醫學院，權力分配的原則較不重視學術研究的成就，因此累積「學術權力」者得到的負面評價較少，願意投資在這方面的教授也較多（Bourdieu, 1996/1984, pp. 73-74）。

Bourdieu指出大學場域存在兩大對立的層級化或合理化原則（principles of hierarchization or legitimation）：「社會層級」（social hierarchy）及「文化層級」（cultural hierarchy）。「社會層級」的分層標準是依據資本繼承和實際擁有的經濟及政治資本，它意味著大學場域對俗世權力的依賴；「文化層級」的分層標準是依據科學權威與學術聲望的資本，它代表了大學對自主權的執著（Bourdieu, 1996/1984, pp. 47-48）。

「社會層級」及「文化層級」大致上是相當於「整合」（integration）及「抽離」（detachment）的二元對立。「整合」是對既有社會秩序的認同，「抽離」則是對現存社會的批判。Bourdieu認為在法國法學院及醫學院的教授傾向整合於社會，因為他們的專業主要是應用已有的法律及醫學知識把混亂的秩序恢復「正常」，在學術圈外擁有更多的政治及經濟權力。文、理學院（特別是理學院）剛好相反，因為它們重視學術研究、鼓勵創新、以及超越既有的想法，因此教授們也傾向對現存採取抽離的態度，這兩大分層原則的對立顯示了整體社會場域中經濟權力與文化權力的對抗（Bourdieu, 1996/1984, pp. 47-51）。

肆、臺灣人文社會學的場域地位

從Bourdieu的場域理論進行分析，必然涉及三個不可缺少並且內在關聯的環節（Bourdieu, 1971c）。首先必須分析與學術場域相對的權力場域位置，揭露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其次，必須勾畫出行動主體或學

門佔據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結構，顯示這一場域特有的合法性權威，以及其間相互競爭從而形成的種種關係；第三，必須分析行動主體的「生存心態」，也就是在學術場域裡某些確定的軌跡中，去發現行動主體如何通過將一定生存條件的知覺，以內在化的方式獲得特殊的稟性。

在全球化的競爭趨勢中，任何國家或學門的學術場域皆不可能成為自我建構、自我滿足的獨立、封閉網絡或系統。因此，臺灣人文社會學術場域的地位，必須從全球化的脈絡與學門間的關係位置下來分析，它涉及到學術相對自主性的兩個向度：第一是臺灣學術場域在世界結構下與西方學術場域之間的關係，這乃是學術相對自主性的國際向度；第二是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場域在國內與其他學術場域，例如與理、工、醫學之間的相對地位，這乃是學術相對自主性的國內向度。

從世界知識體系分析，在全球的知識場域中，各國的學術發展與地位呈現的是階層性和不平等的客觀關係（陳明莉，2003）。首先，從文獻引用的事實，可發現全球學術場域的宰制與被宰制關係。文獻的引用一方面是知識的交流活動，藉由書目的引用文獻，呈現知識的連結關係，更具體的是從文獻引用的頻率可看出知識的產能與產值；另一方面文獻的引用也顯現學術認同的作用。研究發現，臺灣學者的學術論文常引用國外學者著作，但北美、歐陸小國及日本學者卻甚少引用臺灣學者的學術論文（陳明莉，2003）。從1993年到2003年之間，臺灣學者發表的論文共96,394篇，世界排名第二十一，被引用次數420,234次，世界排名第二十六，平均每篇被引用次數4.36次，排名則落到全世界第九十六名（賴鼎銘，2005，頁46），臺灣學術的影響力與地位由此可見。2005年臺灣學術論文數量（15,000篇）雖然全球排名第十八名，但被引用平均次數只有2.74次，排名更落到102名（立報，2006.10.13）。可見我國論文發表數量雖多，但是論文相對影響力卻遠遠不如排名前幾名的歐陸小國，而且每下愈況，顯示出我國以量取勝是一種失敗的策略。

其次，從全世界大學的排行榜大抵可以反映全球學術場域中主流與邊陲的關係網絡與相對位置。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每年進行世界大學的排行，2006年該公司要求全球3,703名學者列出他們專業領域中最好的三十所研究大學，加上全球736名畢業生雇主的回應，並考慮研究論文被引用次數、學生和教職員比例、海外學生和教職員人數等。前二十名大學中美國占十一名，英國占四名，中國、澳大利亞、法國、新加坡、日本各占一名。其中，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仍高居世界前三名（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2006）；此外，

中國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自2001年起也建立全球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資料庫，每年都做學術評比調查，評估標準包括該校教職員及學生獲得諾貝爾獎人數、被廣泛引述的研究學者人數、獲SCI自然、科學雜誌刊載的論文數目、教學與學術表現，以及研究被「高度引用」等學術表現。2006年上海交通大學公布的世界大學排名前三十名評比結果，美國的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史丹福大學和高居世界前三名。前三十名中，美國占二十二名，英國占四名，日本二名，瑞士、加拿大各一名（ARWU，2006）。臺灣至今尚未有一所大學被排行進世界百大之內，在全球學術場域中明顯的處於邊陲，至少是半邊陲的地位。

由全世界大學的排行榜顯示，美國已經成為全球學術的核心，甚至建立起學術霸權的地位。國際留學生每年為美國經濟提供約135億美元收入，教育成為美國服務業中第五大外銷項目（聯合報，2006.11.14）。然而，這種霸權的存在，必須透過學術邊陲的認同才能樹立、維繫和鞏固其地位。依據陳明莉（2003）的研究顯示，在臺灣大學教師的心目中，各國的學術等級由高至低依序如下：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日本、澳洲、義大利、俄國、臺灣、韓國、西班牙、中國；臺灣大學教師對自各國取得最高學位的學者所受重視程度的評價，由高至低依序為：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日本、法國、澳洲、臺灣、義大利、俄國、西班牙、中國大陸及韓國。這些調查資料顯示臺灣大學教師的學術認同完全服膺美國學術中心、臺灣半邊陲的地位。

Bourdieu（1996/1984）指出，高等教育的制度場域，其結構在特殊的邏輯下會再製權力場域的結構，不同學院在經濟和政治權力以及文化聲望兩端之間，依照相當的原則分配在不同的位置，因此從科學到藝術學院以及法律和醫學都有不同的地位，而擁有差異性學術優越的標籤。從國內的向度分析，在臺灣學術場域「學術資本」的分配與占有中，比起理、工、醫、農，人文社會學門總是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姑不論大學各學門的資源分配，從國科會的專題研究補助經費顯示，歷年人文學門加上社會學門的經費都只佔總經費的11%左右，遠不及理、工的一半（如表一），從研究資源的分配可見，臺灣長久以來重理、工、醫而輕人文社會的現象。



表一 歷年國科會專門研究計畫補助款分配

年	理		工		醫		農		人文 社會		科學 教育		其他	合計
	核定 金額	比例	核定 金額	比例	核定 金額	比例	核定 金額	比例	核定 金額	比例	核定 金額	比例	核定 金額	
85	1,312.40	25.1%	1,866.30	35.8%	909.74	17.4%	356.66	6%	564.81	10.8	200.84	3.8%	0.72	5,211.47
86	1,321.74	26.3%	1,725.72	34.4%	867.73	17.2%	328.19	6%	580.61	11.5%	192.59	3.8%	0.00	5,016.59
87	1,462.92	23.2%	2,325.17	36.9%	1,045.88	16.6%	416.18	6%	753.51	11.9%	282.31	4.4%	13.97	6,299.94
88	1,684.03	23.9%	2,528.76	36%	1,221.33	17.3%	469.83	6.6%	815.21	11.6%	303.51	4.3%	0.26	7,022.93
89-1	1,781.70	23.2%	2,644.56	34.4%	1,463.67	19%	554.25	7.2%	883.06	11.5%	350.12	4.5%	0.00	7,677.36
89-2	2,021.91	23.3%	2,990.84	33.4%	1,651.75	19%	610.24	7%	1,011.94	11.6%	389.83	4.4%	0.00	8,676.50
90	2,319.95	23.9%	3,403.22	35.1%	1,677.50	17.3%	609.89	6.2%	1,041.56	10.7%	635.53	6.5%	0.00	9,687.66
91	2,552.55	21%	4,230.88	34.9%	2,551.43	21%	715.49	5.8%	1,466.81	12.1%	591.32	4.8%	0.00	12,108.47
92	3,010.18	23.4%	4,535.13	35.2%	2,355.77	18.3%	749.92	5.8%	1,475.87	11.4%	710.81	5.5%	14.14	12,851.81
93	3,221.91	22.8%	5,103.08	36.2%	2,703.34	19.2%	769.14	5.4%	1,680.54	11.9%	596.90	4.2%	1.03	14,075.94
94	3,810.30	24.9%	5,342.00	34.9%	2,907.94	19%	800.90	5.2%	1,802.32	11.7%	628.89	4.1%	2.25	15,294.61
95	5,040.45	25.5%	6,108.72	30.9%	4,339.10	22%	1,036.87	5.2%	2,293.31	11.6%	901.25	4.5%	1.20	19,720.90

資料來源：國科會網站<http://web.nsc.gov.tw>

從「學術權力」的角度分析，以掌握國家研究資源分配的國科會主任委員而言，歷屆主任委員包括陳建仁（醫療）、吳茂崑（物理）、黃鎮台（化學）、翁政義（機械工程）、郭南宏（電機工程）、劉兆玄（化學）、魏哲和（電機工程）等等，都出自於理、工的學術背景，人文社會學者無人出任此一要職；在學術界擁有最高經濟、社會和符號資本的中央研究院，歷屆院長除了胡適是人文、王世杰是法學背景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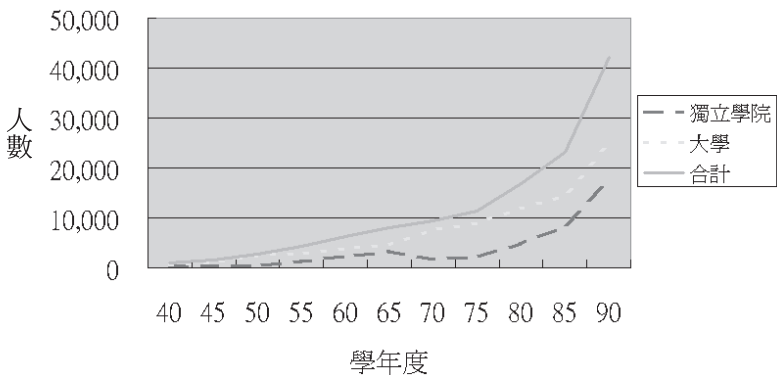
他如錢思亮（化學）、吳大猷（物理）、李遠哲（化學）、翁啟惠（生物、化學），也皆為物理、化學的學術背景；甚至當今四十一所國立大學校長，除了藝術、國防、警察和教育大學外，二十所綜合性大學中，只有台北大學校長是人文社會學背景，其餘校長幾乎是理、工或企管的天下。再以被認為是推動SSCI化學術評鑑的主要人物朱敬一、管中閔、莊亦琦來看，他們都屬於經濟學門領域。因此，臺灣SSCI化的宰制也可以說是經濟學的宰制（郭明政，2005，頁163-165）。整體而言，臺灣的學術場域中，不論「學術資本」、「學術權力」，甚至在「社會層級」上，人文社會學門都是屬於邊陲、隸屬的地位。

伍、臺灣大學教師的生存心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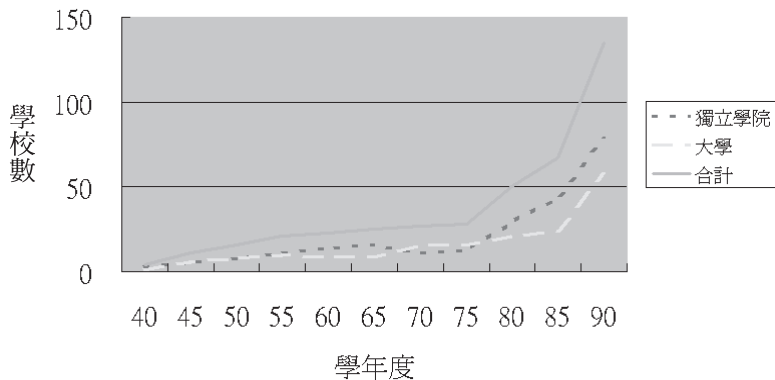
依據Bourdieu的觀點，「生存心態」是行動主體對其客觀的生存條件，透過主觀的知覺，所形成的行為傾向或稟性（Bourdieu, 1977）。Bourdieu（1987）認為大學教授在整體的社會空間處於「宰制階層的被宰制」的位置。他指出相對於作家及藝術家，大學教授的地位更依靠學歷文憑這種「制度化的文化資本」，使他們進入「科層式的職業生涯」（bureaucratic career），獲得固定的收入。因此，跟作家及藝術家相比，大學教授比較類似高級公務人員的生存條件，他們在文化生產場域中，佔領著與世俗權力關係較密切的位置（Bourdieu, 1984b），這意味著他們相對的比較被整合到現存的社會關係（Bourdieu, 1996/1984, pp. 36-37）。

由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40學年度，臺灣獨立學院和大學的教師只有979人，一直到70學年度仍然不到一萬人。當時的大學教授是相當特殊的階層，不僅擁有學術或知識聲望，也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在社會具有相當高的符號資本，以Bourdieu的話說，那是一種神聖的禮物（Bourdieu, 1996/1984, p. 37），而大學教授對知識份子的認同與地位更甚於學術生產者。87學年度開始，由於大學校院的急速擴增，大學教師的人數也急速增加（如圖一、圖二），至93學年度全國大學教師已高達45,702人，與國中（48,865人）、高中職（48,891人）教師人數相差無幾。由於大學教授愈來愈多，環繞在他們身上的不再是以前傳統作家或教授的魅力光環，如今大學教師越來越傾向小生產者，致力於開拓他們自己獨立的學術資本。在生存的壓力下，他們必須定期發表學術論文或向國家（例如國科會）標購研究計畫，累積自己的生產績效。由於研究工作的產品往往背負著生產條件的標誌，這些研究「報告」或「帳單」是依照大眾生產的標準化規範，除了具有時間的壓力外，而且需要依

照經濟開支的合理性，展示工作完成的時間付出和論文份量，例如冗長的方法論、注釋、大量的參考書目等等（即使有些是不需要的），而非研究結果的詮釋或是系統化。今日的大學教授已離知識份子位置越來越遠，變成一種具有自己一套的特殊方法論、生產工具的專業人員，而與批判定義和流行社會的傳統關係劃清界線。



圖一 台灣歷年來大學院校成長曲線



圖二 台灣歷年來大學院校教師成長曲線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http://www.edu.tw/EDU_WEB/Web/STATISTICS/index.php

此外，臺灣大學教師由於對臺灣學術邊陲或半邊陲地位的知覺與認同，多年來已形成對美國或西方學術場域的孺慕和依賴的生存心態。研究發現，臺灣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的文獻引用，只有人文學門以本國語文文獻為主（但仍然遠低於美國各學門使用本國語文文獻的比例），其餘領域仍以使用英文為多（陳明莉，2003）。李德竹（1992）曾就國內五所大專院校圖書館系所教師的著作，進行引用文獻分析，結果顯示臺灣

圖書館學者進行研究時，以使用英文（66.7%）最多，其次才是中文文獻（33.1%）。鄭麗敏（1994）也曾分析臺灣七種圖書館與資訊科學期刊，於1974至1993年所刊載的論文，結果引用文獻仍以英文最多（55.1%）。

陳明莉（2003）的進一步研究發現，臺灣大學教師不僅引用的文獻，研究時所閱讀或是教學時參考的資料、指定學生閱讀的教材，都是以英文為主，使用英文版本的比例皆遠高於本國的學術文獻；大學教師在其研究領域上經常閱讀的期刊及出版品，以及認定最具影響力、權威的期刊及出版公司，絕大多數（88.8%）都是以美國為主的英文學術出版。這些證據顯示，在世界的知識體系內，臺灣大學教師對英文學術出版品的倚重程度，以及臺灣學者如何忠誠地擔任西方核心國家知識的傳播者與消費者的角色。由這些研究數據可見，臺灣學者對當前學術霸權國家與英語世界知識的認同、借用與依賴程度，不可否認的，臺灣學者所從事的學術活動，明顯的具有邊緣性格傾向。

我們知道，對一定場域中的行動主體產生影響的外在決定因素，從來不直接作用在他們的身上，而是只有先通過場域的特有形式和力量的特定中介環節，預先經歷了一段重新形塑的過程，才能對他們產生影響。臺灣當前大學教師大都直接或間接的受到美國或西方的學術洗禮，而在這洗禮的過程中，不只接受知識的內容，也接受了涉及知識價值的認識論、方法論活動，並因而在臺灣學術場域蒙受其益。誠如Bourdieu和 Wacquant（1992, p. 105）所指出的：「任何符號支配都預先假定，在受制於符號支配的社會行動者那裡，存在某種形式的共謀關係。」這種「契合」、「共謀」關係絕非一般的屈服或反抗的關係，它構成了一種其自身無以克服的愈陷愈深的邏輯循環，正是這種契合關係與邏輯循環，使得知識霸權/邊陲的地位獲得確立與鞏固。

陸、結語

當前臺灣人文社會學者對學術規範化運動所透露出來的國家化取向，往往以學術自主性為主軸，展開對既有的知識生產機器進行反思和批判。但是論者皆有學術自主的理想或幻覺，將學術場域視為獨立於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希望透過所謂「去移植化」、「去西方化」，甚至「去美國化」，進行學術文化的切割，來增進和捍衛臺灣學術的自主性。

從以上分析，在全球的學術場域中，臺灣一直處於邊陲或半邊陲的地位，人文社會學門更是處於邊陲或半邊陲場域中的邊陲位置，加上臺

灣大學教師長期對美國和西方學術的依賴，人文社會學者往往具有明顯的邊陲性格。近年來，由於臺灣大學教師人數急速增加，文化或社會資本的分散，加上缺乏累積「科學權力及社會聲望」的條件，使他們只能選擇以累積「學術權力」為目標。在缺乏足夠的社會聲望下，大學教師越來越像國家的高級公務員，逐漸養成「等因奉此」或「照章行事」的生存心態，對大學場域的權威有著類似公務員，甚至軍人的絕對忠誠。在國家的「計畫性知識」的規劃下，如今，大學教師逐漸變成學術生產線的小包工，成為國家競爭力生產大隊的一員，「如何讓期刊接受你的論文」、「如何通過國科會的審查」變成大學教師的生存技巧。這對原本具有「抽離」和批判傳統性格的人文社會學者產生嚴重的學術扞格，也陷入生命的弔詭和生存的困境。漸漸的，臺灣大學人文社會學教師離知識份子的地位也越來越遠，使他們身處批判的知識場域卻隱藏著保守的性格，最多只能「凝視」這種荒謬的存在。

因此，在全球化的學術場域競爭遊戲中，在臺灣大學教師的生存心態中，邊陲學者似乎只能作為跟隨者、旁觀者或註定是失敗者的命運。因為知識趨勢的定義權及實踐的優先權，一直操控在核心學術圈。核心國家利用其優勢的學術出版機制，建構一種扭曲的圖像，即任何有價值的知識生產只發生在核心學術界，而這些有價值的作品也都發表在他們手中的主流刊物。相對的，邊陲世界的學者由於缺乏有效的傳播工具，而被貶謫為次等的「地方性知識」，而半邊陲地區或許只能成為核心國家知識生產的衛星工廠，甚至淪為知識的經銷商。

對臺灣大學教師而言，尤其以人文社會學者自居者，為了避免成為不良學術制度的共謀，為了避免淪為製造論文的機器，使學術工作與生命價值產生疏離效果，必須有主體意識的醒覺與突破，他們唯一的「救贖」是用身體的實踐而非流於口語文字的論辯，人文社會學者必須拋開合法學術制度委託和權力賦與（例如正教授、審查或評鑑者），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層級」，以知識份子的身份參加學術生產的行列。首先，人文社會學者應先以解構國內TSSCI化的層級性為目標，讓臺灣學術期刊多元性的發展。由於當今論文發表評分依據期刊分級，導致少數期刊獨占學術市場，多數期刊在乏人問津的情況下搖搖欲墜，可以預料的，將來我們很難看到百家爭鳴的學術熱潮，在此情況下，科學哲學家Thomas Kuhn（1970）所謂科學革命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幾乎已不太可能，更多的是某種典範的自我繁衍、再製。事實上，不同等級學術期刊的同儕審查標準殆無二致，審查者不會因學術期刊的分類等級給予差別標準，TSSCI名單內期刊的優勢地位是生產與再生產的結

果。為了避免阻絕學術研究的自主性及反思性，也避免窄化學術活動的範疇，甚至窒息了學術生產的生命，如今佔據發言位置，在學門中具有相當資本或高生產力的人文社會學者，應率先投稿國內非TSSCI的期刊，為規格化的學術研究增添些許活力，也讓霸權的神話宰制逐漸崩解。

其次，當前的學術研究雖然受到自由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的影響，但學術生產卻往往未能轉換成商品消費。因為，以期刊為主的學術生產，並不是直接由顧客（社會）的市場購買行為來檢驗，除了國家的干預主導之外，主要是由學術社群自訂標準、決定良窳，即所謂的「同儕審查」（peer review）機制。姑不論同門相輕、或異派爭鬥的事實，在「嚴謹」的學術規格和專業要求下，學術生產的論述形式逐漸脫離社會一般生活語言，學術研究結果往往無法分享、回饋社會大眾，所謂學術活動只是學術工作圈內人的「自我消費」、「自high」或「學術轟趴」罷了，很難達成知識傳播的社會功能。因此與其自我設限，倒不如讓自己的學術生產，直接面對妳/你的讀者——廣大的社會大眾，以專書出版的方式重建系統知識的價值，甚至以網路書寫或個人「學術部落格」的方式呈現，增加與大眾接觸的機會，讓讀者自由參閱與鑑賞，以目前網際網路的普遍性，被閱讀的頻率與回應的程度必定高於市場狹窄的學術期刊。

此外，當前學術期刊的同儕審查機制，雖然可為論文品質產生管控和背書的效果，但由於狹隘學術生存心態的影響，有異於審查者知識認知、學術性格與書寫風格的論文，常常不是被拒絕，就是被要求按照審查者的意見加以修改，其間缺乏開放學術論辯與對話的空間，以至於修改後刊登的論文可能原貌盡失，甚至於幾乎不識何人之作，失去原創性的價值。更由於論文發表篇數涉及學術資本或權力的累積與排序，有些審查者在權力意識的作祟下，濫用權力大刀闊斧，論文審查儼然成為學術的殺戮戰場，許多論文因而紛紛中箭落馬，導致退稿率偏高，甚至造成有些期刊雖然稿源不缺，審查結果卻發現無稿可用，陷入被迫延期出刊或停刊的窘境。為避免專斷的同儕匿名審查作風，或許可以「同儕評論」（peer commentary）的方式代之，也就是類似目前應用心理研究期刊的做法，以「評論的評論」（comments on comments）的設計方式，讓評審者的意見公開，並將作者對於評審者意見的答辯（rebuttal）隨附於正式刊登文章之後，求取更多人（同儕讀者）的公論與回應，一來可相互約束避免偏頗之見，二來可增加平等對話的機會，提高學術論辯的深度和廣度¹。

1. 此項建議是採納一位匿名審查者所提的高見，在此特申謝意。

最後，學術場域之所以能獨立於政治、經濟場域，在於掌握了自設標準和合法性的能力。人文社會學者若以學術自主性出發，面對當前SSCI化的評審制度，與其等待制度的改變，倒不如採取身體力行的對抗策略，在任何學術評等裡，如大學評鑑、教師升等或獎勵，以共識或默契的方式，採取非SSCI化的評審理念，打破量化的迷思，以質審而非量審的方式，讓真正有品質的學術生產獲得應有的回饋，而非被動的等待制度的改變，這才是真正釜底抽薪的辦法。更激進的做法是，我們必須摒棄知識霸權的意識，以差異、多元和寬容的態度，接受並期待各式各樣知識的產生，甚至透過傅柯（M. Foucault）所提出的「被壓制知識的暴動」（insurrection of subjugated knowledge）（Foucault, 1980），進行學術的反動與批判；而當前一些非SSCI化的學術論述也必須習慣於自己的邊緣位置，不服膺於霸權，維繫自己知識的尊嚴與生產的能量，以「自異性」建構另眼相看的知識場域，讓知識的宇宙充滿大大小小的星星不停閃爍。

參考文獻

- 國科會：臺灣學術論文國際化鎖定中東歐國家。（立報，2006.10.13）。
- 李丁讚（2005）。學術生產、隱形學群與學術評鑑，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全球化與知識生產**，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頁301-312。
- 李德竹（1992）。我國圖書館教師研究趨勢及資訊需求之調查報告，臺北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郭明政（2005）。以SSCI及TSSCI為名的學術大屠殺，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全球化與知識生產**，臺北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頁153-178。
- 陳明莉（2003）。臺灣學術場域的知識生產、消費與傳播。**教育與社會研究**，5：1-46。
- 賴鼎銘（2005）。以國外幾種代表性的學術評鑑，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全球化與知識生產**。臺北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頁31-66。
- 鄭麗敏（1994）。近二十年來臺灣地區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期刊論文引用參考文獻特性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私立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研究所，臺北市。

各國留學生為美國貢獻135億。（聯合報，2006.11.14，C7版）。

ARWU. (2006) ARWU Disclaimer. from <http://ed.sjtu.edu.cn/ranking.htm>

Bourdieu, P. (1971a). Intellectual Field and Creative Project, In M. F. D. Young (Ed.), *Knowledge and Contro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 161-188.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Bourdieu, P. (1971b). Le marche des biens symboliques, *L'Année Sociologique*, 22, 49-126.

Bourdieu, P. (1971c). Champ du pouvoir, champ intellectuel et habitus de class, *Scolies* 1, 7-26.

Bourdieu, P. (1972). *Esquisse d'une theorie de la pratique. Precedee de trois etudes d'ethnologie kabyle*. Geneva: Droz.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8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Portics*, 12(November), 311-356.

Bourdieu, P. (1984). Le champ litteraire: Prealables critiques et principes de methode, *Lendmains*, 36, 5-20.

Bourdieu, P. (1987).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Juridical Field. *Hastings Journal of Law*, 38, 209-248.

Bourdieu, P. (1988). Flaubert's Point of View, *Critical Inquiry*, 14 (Spring), 539-562.

Bourdieu, P. (1989). *Noblesse d'Etat, Grandes écoles et esprit de corps*. Editions de Minuit, Paris.

Bourdieu, P. (1996/1984). *Homo Academicus*. translate by Peter Collier, (P. Collier, tr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urdieu, P., & Wacquant, loïc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Ed.), Colon Gordon, N.Y.: Pantheon.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Enlarg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wartz, 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2006). The Times Higher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06. from <http://www.thes.co.uk/worldrankings/>